

# 把握文明共同体的生命脉搏

——《南方文物》“华夏与欧亚诸文明”开栏语



王铭铭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华夏身处欧亚大陆东部,经史前到“封建”的转化,再经秦汉帝制的确立,成长为一个超社会的文明共同体。这个文明共同体本身并非民族性的,而是一个介于民族与世界之间的“多元一体格局”,其生命的养分,来自使“多”与“一”得以协调融合的宇宙观系统。这个宇宙观系统使华夏有别于欧亚大陆其他文明,特别是印欧文明与闪米特文明。然而,数千年来,作为欧亚诸文明的核心成员之一,华夏通过其周边的“中间圈”与其他文明频繁往来,在文明的扩散与借鉴中,与后者共同造就了某种文明的“主体间性”局面。要实现文明的“文化自觉”,便要把握文明共同体的生命脉搏,而要把握这一脉搏,便既要通过深挖“多重证据”,追根溯源,又要“环顾四周”,考察诸文明的差异与关联。对于我们认识文明共同体研究这一使命的双重性,不少置身于人文学诸领域中的学者已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我们仍旧面对着通过重温社会科学主要理论支柱的典籍之文明叙述达成“凝视与环顾”的使命。

本辑汇集了述评性笔谈五篇,涉及华夏、印欧、古希腊、闪米特诸文明系统的研究,都曾于2020年11月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召集的“葛兰言的学术世界”论坛上提交过。这组文章各有主题,但共同展现了法国社会学年鉴派欧亚文明研究的面貌,其所述及的原典,对于我们拓展古史研究的视野,将有着可贵的启发。

葛兰言(Marcel Granet)出生于1884年,师从汉学大师沙畹(Édouard Émmannuel Chavannes)、社会学大师涂尔干(Émile Durkheim)及莫斯(Marcel Mauss)。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他完成一系列杰作,塑造了“华夏世界”的文明形态,赋予汉学以社会学/社会人类学气质。葛兰言“是法国社会学派内一位大师,西洋中国学一个新的学派之开创者”<sup>①</sup>。1940年11月

25日,他在其办公室遭纳粹当局训问,在归家路上离世了。这位著作等身的先贤时年仅56岁。

笔者1980年代后期才初识葛兰言的名字。那时,作为在英学习社会人类学的博士生,我正准备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地开展年度节庆的研究,我需写作开题报告,为此,我阅读了葛氏所著《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中国人的宗教》等书。英国社会人类学传统上侧重当代研究,而我主要研究在田野工作中所见到的各类年度节庆及相关的“观念形态”(特别是“民间观念形态”),这些与葛兰言的古代文明论关系并不直接。我在博士论文中遗憾地并没有切实运用葛兰言的观点。那时我未能理解葛兰言之学的智识用途。不过,我还是暗中关注了其在学术史中的特殊重要性。我发现,自1970年代初起,莫里斯·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这位曾专攻中国东南地区的宗族、宗教及香港、东南亚华人社会的汉学人类学家,转向了对葛兰言和高延(J.J.M. de Groot)的人生史和学术史研究<sup>②</sup>。当时他对于英国社会人类学及与之关系甚密的“燕京学派”社区研究之“无时间性”有质疑。他认为,要缔造一门汉学人类学,便要有个完整的中国观,而要有完整的中国观,便要从那些自称为民族学家(如高延)与社会学家(如葛兰言)而非人类学家的老一代学者之宗教-宇宙论著述再次出发。这点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完成博士论文后,有几年,我曾从事“乡土中国”研究。期间,我关注了民间仪式中的朝山现象。接着,在进一步摸索的过程中,我发现,人们熟知的印欧单一圣山模式,是有文明特殊性的,而葛兰言及其弟子(如石泰安[Rolf Alfred Stein])专注于汉藏文明,其笔下的圣山并不是单一的,而属于“众山”模式。如我感到的,这个反差,似乎是欧亚诸文明差异的集中表现。

为了突破欧洲文明的形态局限,葛兰言眼光向东,他发现,中国文明是特殊的,需要内在地、历史地加以理解,但正是这一特殊的文明含有某种“普适原理”。为了找到中国文明背后的这一原理,他从古史入手,将帝制的来临视作史前和“封建”的转化。葛兰言认为,在古代中国,比起古罗马式的法权制,兼容并蓄的道德人格模范,及其关系主义属性,具有更为根本性的意义。葛兰言在《华夏文明》(或译《中国文明》)一书中写到,只有当所有思想都汇聚于汉武帝这一道德人格模范身上时,“天下”才成为可能的<sup>③</sup>。这与欧洲的一神教和法权制有所不同。在追问中国文明这一特征的由来之时,葛兰言综合了涂尔干、莫斯与沙畹的智慧。

关于葛兰言笔下华夏文明的特征,十年前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做了概括<sup>④</sup>,我现在的看法没有变。在我看来,葛兰言的中国(华夏)文明论有以下三大内容:

1. 他不认为亡灵是人类最原初的信仰,而认为,来自山川和文野之间的“自然境界”,才是中国宗教的源泉。

2. 他试图破除神话传说与历史的界线,既不把神话传说当作真实的历史,又承认神话具有的历史属性,与此同时,他还借助神话传说的结构原理,解释历史对于文明原理的历史转化/演绎。

3. 他对古代中国的封建式大一统秩序,及有助于对此一秩序的保持起到关键作用的文明传统,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认为,帝制虽开创了一个不同于“古典时期”的传统,因而亦可谓是某种社会进化的成果,但这个传统与此前的文明积淀有着深刻连续性。

葛兰言为学专一。终其一生,除了汉学,葛兰言似乎未曾写过其他方面的论著,其汉学论著亦均给人一种给与华夏文明特殊对待的印象。葛兰言从远方“极西”之地给华夏投来的青睐,必定会被人们用来重申“特殊的中国”之“例外性”。然而,必须指出,在论述中国的过程中,除了得到汉学大师沙畹的教导,及在中国得到他的友人及“受访人”有关社会、文明与宇宙观的启迪之外,葛兰言还广泛参考了涂尔干依据“原始”和“现代”社会之间的洞察得出的结论。他对其亲密的师友莫斯基于印欧文明和“原始社会”的文献与民族志,对献祭、历法和礼物展开的探索,也深有认同。此外,精于中国学的葛兰言也有不少默默的追随者。他们与葛兰言大致同时,对古代罗马和希腊展开了“人类学研究”,在此过程中,悄然从葛兰言之学中获益。而在此过程中,葛兰言也将其友人们笔下有关其他文明的形态放置在自己的思想深处,在一个不张扬的比较视野下审视着“华夏世界”。

总之,葛兰言和他笔下的华夏,并不孤立,而是与一组多线的学脉,及一组不同的文明相关着的。

葛兰言属于一个知识分子团体(年鉴派),这个团体有明确的导师、纲领。这个团体内部有分歧和争鸣,但有共同概念和追求。这个团体支撑的学派与民族志学、历史、语文学有着密切关系。1914年后,其

不少成员投身于以“文明”为界定的区系研究和比较,共同致力于超越“欧洲地方主义”的普遍主义事业<sup>⑤</sup>。

年鉴派一方面有涂尔干、莫斯、赫兹(Robert Hertz)、列维-布留尔(Lucien Lévy-Bruhl)等致力于挖掘“原始性”的学者,另一方面,又有若干杰出的欧亚文明研究者。而这些欧亚文明研究者似乎又可分为两类。一类如于贝尔(Henri Hubert),重视对欧亚文明边缘的人群(如,凯尔特人)的民族史或“历史人类学”研究。另一类则是对欧亚文明主要板块或者核心类型展开研究的学者。这些如杜梅齐尔(Georges Dumézil),他对印欧系统(特别是罗马)文明类型展开了深入研究,如热尔奈(Louis Gernet),他创建了“古希腊人类学”。这两个人物一个比葛兰言稍小(杜梅齐尔生于1898年),一个比他稍长(热尔奈生于1882年),也专注于各自关注的类型。但他们承认背后都有葛兰言之学在悄然起着作用。另外,年鉴派在研究的印欧、古希腊与中国这些文明类型的过程中,似乎极少涉及欧亚大陆的另一个文明类型,这便是“闪米特文明”。这个文明曾在英国得到罗伯森-史密斯(William Robertson-Smith)的重点研究,而罗伯森-史密斯的著述借助了闪米特宗教的研究,推动了人类学宗教文明研究从信仰范式转变为仪式范式。他致力于表明,在欧亚诸文明中,闪米特是“最原始的”,保留有图腾崇拜的传统,而这表明,宗教仪式是人回归于物的实践。年鉴派对罗伯森-史密斯的论点有严厉批评,但却深受他的学术的影响。

深入理解葛兰言之学的内涵,仍是一项尚待完成的任务。

20世纪40年代,鉴于葛兰言之学的重要性,杨堃先生曾建议系统分析葛兰言的著作,借鉴葛兰言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宗教论和家族论,他还畅想了系统翻译葛兰言著述的前景<sup>⑥</sup>。经过了数十年的停顿,20年来,葛兰言之学的研究得到重新关注,葛氏论著有几部已得以翻译,对其成就的整理也得以初步开展。遗憾的是,杨堃近八十年前建议的那几项工作,离完成仍旧有着相当大距离。

近来汲喆、赵丙祥等君已开启系统翻译出版葛兰言文集的计划,这令我格外欣喜。然而,欣喜之余,我也不无焦虑地注意到,近期学界广泛存在的某种将华夏特殊化的倾向,对“文化特殊主义者”而言,葛兰言的著述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证实”了华夏的特殊性。我心想,要还葛兰言笔下的华夏本来面目,给与中国妥善的文化定位,除了全面把握诸如葛兰言之学之类的“学术世界”的内涵外,也要复原此类“学术世界”学脉的交互性与多文明的关联性。

令人欣慰的是,除了葛兰言研究之外,这些年来以上提及的那些欧亚文明论著也得到了学界重视。借召集“葛兰言的学术世界”论坛(2020年11月14日在北大文研院208会议室举办)之机,我约了几位晚辈,邀其共同摸索与葛兰言之学相关的学脉,勾勒与伴随在这些学脉左右的“欧亚诸文明”之形象。

构成这个专辑的几篇文章,都曾在那个论坛上发表过。我们的论坛,评议人是葛兰言《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一书<sup>①</sup>的译者、对葛氏论著颇有研究赵丙祥教授。作为主角的引言人,则有四位,包括吴银玲、沈玉婵、颜荻、罗杨。这四位有三位(吴、沈、罗)曾是北大博士生,一位(颜)为剑桥大学博士。吴银玲博士从硕士阶段开始,便专门研究葛兰言对中国宗教的看法,她全文翻译了葛氏《中国人的宗教》(待版)。沈玉婵博士应该是国内首位写了一部关于杜梅齐尔思想的博士论文的学者,她的论文不仅全面概述了杜氏的人生、著述和思想,还对其“三功能说”对东亚学界的影响及在游牧文明研究中的可运用性进行了考察。颜荻博士专攻古希腊文明,对其“地生人”神话有深入研究,此次为了参与讨论,专门阅读了热尔奈的《古希腊的人类学》一书。罗杨博士是四位中辈分最高的,在域外民族志学方面有所建树,多年来也利用业余时间翻译了罗伯森-史密斯的《闪米特人的宗教》一书(待版)。

四位作者的四篇文章,各自刻画不同先贤的思想肖像的局部面貌,这便使这组文章读起来似乎缺乏显然的关系纽带。然而,如我期待的,当这些看起来松散的述评集合成一组文章后,它们便能构成了一个主张:在关注葛兰言之学的内涵之同时,我们也要重视这位巨匠周边的学者的相关研究,及这些相关研究对于理解华夏的、有待挖掘的潜在意义。

这很容易让人想起麦克斯·穆勒(Max Müller)这位先贤。他是生于1823年的德国人,1848年起,任职于牛津大学,在其1856年发表的《比较神话学》<sup>②</sup>中,将欧亚大陆分为三大“方言区”,包括印欧、闪米特和图兰。后来如人类学奠基人泰勒(Edward Tylor),为我们指出,这三大板块内部文明发展并不平衡,各自包含了各种文化形态<sup>③</sup>。由于穆勒的兴趣是人之初经由方言期到神话期再到民族期的演进,因而,对他而言,各异(民族性)文化形态是方言区(亦即后世称之为“文明”的东西)分化的结果(也就是说,对穆勒而言,方言区是“原初性的”)。所谓欧亚和闪米特,大体是我们理解的“西方”的两个原乡,而图兰则是这些之外的一个宏大的欧亚“非西方”世界。

在对欧亚进行研究中,人类学家似乎越来越沉浸于穆勒所说的“民族期”的文化形态中,对于历史更深远的方言期文明区系越来越轻视。而事实告诉我们,这些区系内部虽是多元复杂的,但其形态有着强大的绵续力。也就是说,穆勒说的“民族期”之到来,并没有导致其所由来的“文明母体”的死亡——否则,我们便无法理解近二三十年来引起广泛关注的“文明冲突”了。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在处理欧洲各“民族”与其文明母体的关系时,学者们有的诉诸印度,有的诉诸古希腊,有的诉诸古罗马。这些可谓是西方的他者,作为其异类兼祖先的他者。而相比之下,似乎极少人有图兰(东亚、内亚、西伯利亚)情结。所谓图兰似乎以至起着欧洲自我认同的镜子的作用。在某种

程度上,这个区系与于贝尔等人笔下的边缘文明、边缘民族之间的“通性”,值得我们来日加以深究。另外,对这三大文明板块的研究,也似乎重视比较,特别是重视比较年代早晚和同时性差异。然而,各种研究之间却又存在密切关联,其相互参照引申,实属常态。有大量的文化史研究表明,文明之间的通道或“走廊”,是文明区系生成的条件。这也就是说,文明之分是以其互动为背景乃至条件的。由于这个原因,欧亚诸文明向来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如我在另一个地方表明的,如果说欧亚曾经存在三大文明区系,那么,在每个区系中都是可以发现其他区系的因素的。尤其是在葛兰言专注于考察的华夏,除了图兰和“边缘”因素,印欧和闪米特因素,向来也很重要<sup>④</sup>。倘若我们可以就此认为,“异类”往往是内在于中国的,那么,在其逝世八十周年后,纪念葛兰言,也给我们添加了一项任务:对其笔下的华夏文明类型进行“杂糅文明论”的补充。无疑,我们在这个场合对葛兰言的华夏及文明的其他区系展开的“解读”,将是进行迈向这一补充的必要步骤。

#### 注释:

①杨堃:《葛兰言研究导论》,载其《社会学与民俗学》,第108页,四川民族出版社,1997年。

② Maurice Freedman,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ety*, Selected and Introduced by G. William Skinn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351-169;398-406.

③ Marcel Granet, *Chinese Civilization*, translated by Kathleen Innes and Mabel Brailsford,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and Co. Ltd, pp.377-404.

④王铭铭:《葛兰言(Marcel Granet)何故少有追随者?》,《民族学刊》2010年第1期(创刊号)。

⑤王铭铭:《社会中的社会——谈涂尔干、莫斯〈关于文明概念的札记〉》,《西北民族研究》2018年第1期。

⑥杨堃:《社会学与民俗学》,第136页,四川民族出版社,1997年。

⑦葛兰言:《中国古代的节庆与歌谣》,赵丙祥译、张宏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⑧穆勒:《比较神话学》,金泽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

⑨泰勒:《原始文化》,连树声译,第18~5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⑩王铭铭:《超社会体系——文明与中国》,第418~42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

(责任编辑:周广明)